·名家论坛·

DOI:10.20004/j.cnki.ujn.2024.01.001

史料学、历史文献学视域下对党项与西夏史料的异同认知述评

李华瑞

(浙江大学 历史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0)

[摘　要]党项与西夏的史料就是党项与西夏国发生、发展、消亡过程中的史迹遗存、文字记录和口碑资料。具体地说就是唐、五代、辽、宋、西夏、金、元时期的汉文党项与西夏史料、西夏文文献和考古发现,亦即唐、五代、宋、辽、金士大夫和西夏人书写的党项和西夏史料,是党项和西夏存续期间同时代的人的历史见证,是故其史料性质对于研究党项与西夏而言是第一手资料。而明清时期的汉文西夏专史,从文献整理上有其独特的价值,但是对研究党项与西夏的历史只有学术上的研究参考价值,而不能作为原始史料征引。

[关键词]史料学;文献学;党项;西夏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24)01-0005-08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主要有文字、实物和口传等史料形式,依其性质还可分为原始、撰述、文艺和传抄等史料类型,还有按照史料的版本、内容来分类的,不一而足。但不论怎样说,文字史料的载体是文本亦即文献,如何看待文献记述史料,史学家存在着不同认识。

众所周知,史料对于历史学工作者而言,其搜集辨识、考镜源流、去伪存真,原本是属于集于一身的基本功,但是随着史料载体文献的日积月累,史学编纂著述的日益纷呈,特别是进入20世纪,随着新史学的诞生,对历史研究对象——史料的研究,也在林立学科分化中形成了史料学、历史文献学(或言古典文献学)和史学史等学科,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科间的壁垒日益强化。对于史料学的概念界定,史学界存在两种类型,其一为甄选和使用史料的规律与方法,即史料学通论;其二为对某个时期或领域的史料,考证来源,评估价值,研究使用,即史料学[①]。历史文献学则是一门基于文献本体,以文本为主干的学问,主要对文献的形态、整理方法、鉴别、分类与编目、收藏、形成史、特点、用途和检索等进行研究[②]。蕴藏历史内容真相的文字资料,就是历史文献。历史文献学是以历史文献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不仅面对众多类别的文字资料,而且研究手段也多种多样,版本学、目录学、金石学、辨伪学等,其既有相对独立的研究手段,又统属于历史文献学当中[③]。故此史料学和历史文献学虽然有所分工,但是从不同角度都是以研究史料载体为主。学科分立虽然对于专门研究某一方面可以更加细致和深入,但弊端也很明显,即学科相轻日益严重。

[作者简介]李华瑞,浙江大学敦和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有突出贡献政府特殊津贴",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邮箱:lihr2002@163.com。

①参看陈高华,陈智超:《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修订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②参看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页。

③参看乔治忠:《对"史料学"、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关系的探析》,《学术研究》,2009年第9期。

以党项与西夏史料言之,从党项第一次出现在汉文史籍至元朝灭亡西夏,西夏遗民渐次融入元朝境内各民族间,历史走过了大约八百年的时间。由于元朝史臣未给西夏修正史,西夏又没有如辽金仿照中原政权建立较为完整的修史制度,而西夏中后期撰写的少许西夏王族历史的资料在蒙元战火中消失殆尽[①],是故,党项与西夏汉文史料多散见于中原王朝史官、边臣和士大夫的记载中,几无完整详尽系统的叙述。明清以来为恢复党项与西夏历史的面貌,开始从唐、五代、宋、辽、金、元史乘辑录相关资料的工作。但是从史料学、历史文献学和学术史的角度较为全面梳理和整理党项与西夏汉文史料的流布及价值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

一、从史料学的角度介绍党项与西夏史文献和史料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七卷,陈振《五代辽宋夏金时期》,李范文《西夏通史》,均对党项和西夏史料进行了简略概述。而从研究党项与西夏史的角度对其史料进行了较为全面梳理的则是汤开建、罗矛昆《西夏史料概述》[②]和白滨《党项史研究》[③]。

汤开建、罗矛昆在《西夏史料概述》一文中将西夏史料分成三部分:宋以前的党项史料(43种)、宋辽金时期的西夏史料(129种,不包括西夏文)、元以及元以后的西夏史料(36种)。前两部分又按基本史料和一般史料分述。基本史料主要是官史和私史,一般史料则是大型类书、文集、笔记、稗史、杂录。第三部分因选录不多没有分基本和一般史料,而是一并总述。该文注重文献的版本和史料记述的侧重点。由于是首次较为全面、系统缕述党项与西夏史料,因而对于初涉党项西夏史的学者大有裨益。

白滨《党项史研究》在第二章史料简介中将汉文史料划分的更为细致,分为:1. 唐以前党项史料;2. 唐代党项史料;3. 五代时期党项史料;4. 宋、辽与金时期的党项和西夏史料;5. 元及元后的党项和西夏史料五个部分。史料按各类官史、私史、文集、笔记及其他分门别类地介绍,较为重要的典籍《隋书》《北史》《旧唐书》《新唐书》《通典》《唐会要》《册府元龟》《资治通鉴》《文苑英华》《太平御览》《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五代会要》《全唐文》《宋史》《辽史》等,白滨先生还一一做了简要的导读,分析其史料价值之所在。有的典籍,白滨先生特别指出其版本对使用史料的影响,如在介绍《续资治通鉴长编》时指出:“今日通行的浙局本是清代被改译过的本子,清修《四库全书》时,馆臣‘奉命改译辽、金、元三史人地官名’,《长编》中党项、西夏的人、地、官名都在改译之列。但《四库全书》在改译时,有的改了,有的未改,一部书里,有时一个地名出现两种译文,会让人误为两个地方。目前正在出版中的中华书局标点本依据《宋史》及宋元史籍将其一一改回,但也有遗漏。所以在利用《长编》的党项、西夏史料时都要根据版本的不同详加考核。”[④]关于宋代史籍,《党项史研究》一书如此记述:“宋人著作流传至今,或后人辑录、编集的约千种以上,约有半数左右涉及西夏史事的记载。”[⑤]可见白滨先生的考察是相当深入的,也是符合事实的。白滨先生与汤开建、罗矛昆都将西夏史料下限定在元朝灭亡前后,并且强调:“对明、清以后编撰的西夏史籍要作认真的考核,以衡量其价值。”[⑥]这种慎重的取舍态度是非常可取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了多种有关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的著作,其中陈高华的《中国古代

①李华瑞:《元朝人不修西夏史刍议》,《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②汤开建,罗矛昆:《西夏史料概述》,《宁夏社会科学通讯》,1985年第6期。

③白滨:《党项史研究》,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④白滨:《党项史研究》,第73页。

⑤白滨:《党项史研究》,第74页。

⑥白滨:《党项史研究》,第84页。

史史料学》[①]面世后，受到学界的重视，之后此书在重新修订的基础上一版再版。本书对西夏史史料的撮要介绍，简明而较为全面，全书共分七个部分：1. 宋、辽、金史的《夏国传》及有关的纪、志、列传。此部分认为西夏和历代王朝一样，设有专门机构，专司实录和国史的纂修。可惜的是，西夏的实录和国史都没有流传下来。关于这一点，本书如此记述："宋、辽、金三史的《夏国传》(《西夏传》)的记载都是从本国的角度出发，记载西夏与各自国家的关系，概括起来，不外是和平时期的朝贡关系和冲突时期的战争情况。而对西夏国内的情况，特别是社会阶级结构、生产力水平等等方面，语焉不详，记载的很不完全的。"[②]这个评语可谓点睛之笔；2. 宋人著作，包括宋代基本史料、宋人文集、宋人笔记三部分；3. 金、元人著作；4. 有关唐史、五代史诸书，主要是记载关于西夏建国前的党项史史料；5. 西夏文文献。此部分对俄藏、英藏黑水城文献与中国藏西夏文文献进行了介绍，尤其重要的一点是，该部分记载了各种西夏文文献中的有关法律文书，这是研究西夏史最重要的文献资料。其中，《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作为仿唐、宋律令编制的西夏法律，内容充实，关涉西夏社会生活诸多方面；6. 清人和金人著作(详见后论)；7. 考古文物发现[③]。

顾吉辰《宋人西夏著作考》一文，首次将宋代目录文献和史籍文献作为研究重点，对记载宋人西夏著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稽考，稽考出包括今存和今已佚两部分31种关于宋人西夏的著作。

以上从史料学角度介绍了唐、五代、宋、辽、金士大夫书写的党项和西夏史料，是党项和西夏存续期间同时代的人的历史见证，是故其史料性质对于研究党项与西夏而言是第一手资料。

二、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对党项和西夏史料进行梳理

2007年，胡玉冰所著《传统典籍中汉文西夏文献研究》[④](以下简称《文献研究》)一书面世，该书共分四章，以时代为经，文献为纬，分别对宋、辽与金时期、元代、明代和清代的汉文西夏文献进行了梳理和研究，这与前述汤开建、罗矛昆、白滨以介绍史料分布为主不尽相同。

(一)《文献研究》的优点

西夏虽然只是一个由党项族建立而偏居西部的地方政权，不论是幅员还是其经济文化发展程度，都无法与宋朝相提并论，但是宋在与西夏交往过程中却常常处于尴尬的地位，以至宋神宗慨叹"然夏国自祖宗以来，为西方巨患，历八十年。朝廷倾天下之力，竭四方财用，以供馈饷，尚日夜惴惴然，惟恐其盗边也。"[⑤]南宋初年李纲也说："谋画之臣竭智于内，介胄之士用命于外。"[⑥]所以宋朝官府文件、国史和士人奏章、著述留下了大量有关西夏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人文地理、民族风俗、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的资料。这些资料构成了西夏社会历史汉文文献的主干部分。

对此，《文献研究》在论说宋代汉文西夏文献时亦有类似的看法："为帮助朝廷制定出有效的御夏策略，以尽快解决迫在眉睫的边患问题，一批介绍西夏王朝民族、地理、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军事外交等诸多情况的文献在宋朝应运而生了。宋人编写的这些汉文西夏文献为了解西夏提供了较为真实、可靠的材料，而且这些文献也成了宋以后史家编纂西夏史最直接的史料来源。"[⑦]蒙古灭亡了西夏，西夏遗民在元朝境内生殖繁衍并逐渐与其他民族融合，元代汉文西夏文献

①陈高华：《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

②陈高华，陈智超：《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修订本)，第281页。

③陈高华，陈智超：《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修订本)，第281-285页。

④胡玉冰：《传统典籍中汉文西夏文献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⑤(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9，元丰七年十月癸巳。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376页。

⑥(宋)李纲：《梁溪先生文集》卷144《御戎论》，《宋集珍本丛刊》，第37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524页。

⑦胡玉冰：《传统典籍中汉文西夏文献研究》，第22页。

成为西夏灭亡史和西夏遗民活动的主要载记者。

第一,该书对宋元时期西夏汉文文献做了迄今为止最为全面详尽的梳理和研究。在白滨先生对重要典籍进行导读的基础上,增加了数量和扩大了考订范围。

宋代6种汉文西夏专题文献:1. 曾巩《隆平集》;2.《宋大诏令集》;3. 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4.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5. 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6.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宋代22种汉文御夏"议边"文献:1. 薛向《边陲利害》《陕西建明》;2. 曾致尧《清边前要》《西陲要纪》;3. 赵瑜《安边致胜策》;4. 刘质《边防要论》;5. 陈贯《形势》《选将》《练兵论》;6. 张宗海《景德安边论》;7. 盛度《景祐边计十事》;8. 景泰《边臣要略》《平戎议》;9. 徐复《边防策》;10. 丁度《备边要览》;11. 张方平《平戎十策》;12. 魏庭坚《四夷龟鉴》(已佚);13. 王琥《平戎方略》(内容不详);14. 蔡禀《通志论》;15. 贾昌朝《庆历边备六事》;16. 范仲淹《攻守策》;17. 姚仲孙《防边龟鉴》;18.《兵策》;19. 吴遵路《陕西御戎要略》《边防杂事》;20. 范育《清野备敌法》;21. 郭申锡《边鄙守御策》;22. 任颛《治戎精要》。

宋代17种记述西夏史料的史籍文献:1. 钱若水《太宗皇帝实录》;2. 曾布《曾布日录》;3.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4.《宋会要》;5.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会编中散见的这些西夏史料主要集中在马扩《茆斋自叙》、赵良嗣《燕云奉使录》、晁公忒《金人败盟记》《神麓记》等文献中);6. 熊克《中兴小纪》;7. 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8. 吕祖谦(笔者按:误,应是吕中)《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9. 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10. 宋起《种太尉传》;11. 李埴《皇宋十朝纲要》;12.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13. 陈均《宋九朝编年备要》(皇朝编年纲目备要);14. 杨仲良《通鉴长编纪事本末》;15.《续编两朝纲目备要》;16. 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17. 宇文懋昭《大金国志》[①]。

上述45种汉文西夏文献不仅将传世文献作为主要介绍对象,而且对文献本身进行了具体考证,亦即从文献作者生平(包括姓氏字号、籍贯、生卒年月、仕履、学术成就)、成书年代、文献内容及史料来源、史料价值评议、版本源流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丰富了学界对于宋代汉文西夏文献的认识。

另外该书还列举了宋代36种散见的西夏史料笔记[②],宋人69种散见的西夏史料文集[③]。

前揭白滨先生说大约有500种左右的宋代传世文献涉及西夏史事,胡玉冰梳理的宋代传世文献约计150余种,虽然不及总数的三分之一,但是基本涵盖了宋代文献所记西夏史事的主要部分,其他文献或重复、或只言片语,其实际价值并不比现今已稽考的文献所记西夏史事高出多少。

第二,该书按照编纂年代的时序,将正史中最重要的《宋史》《辽史》《金史》置于"汉文西夏文献"一章中叙述,在讨论元代史家的西夏史观、元代西夏文献的聚积与散佚二节之后,较为详尽地叙述宋、辽、金三史《夏国传》的编修过程、资料来源、特点及价值,同时对三史本纪、志书、表和列传中散见的西夏史料也一一作了介绍和评议。

除此之外,《文献研究》还记载了今存元代史籍、文集和其他文献中散见的西夏史料,包括:1.《圣武亲征录》;2. 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3.《宋史全文》;4.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5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另外还包括数种石刻文献、方志文献和开列元人28种散见西夏史料的文集。

辽金虽然也是西夏的宗主国,但是辽金记述西夏史料留下的太少,袁桷搜访的宋辽金三史图书中,"可以肯定是记载西夏事的书有两部,即《赵元昊西夏事实》和《西夏事宜》。这两部西夏书历代公私目录均未见著录"[④]。据清人黄任恒撰《补辽史•艺文志•史部•载记类》曾著录有《夏国史》,

①胡玉冰:《传统典籍中汉文西夏文献研究》,第128-145页。

②胡玉冰:《传统典籍中汉文西夏文献研究》,第145-156页。

③胡玉冰:《传统典籍中汉文西夏文献研究》,第156-171页。

④胡玉冰:《传统典籍中汉文西夏文献研究》,第195页。

但其内容已不为后世所知。元人修《金史·西夏传》，提及《西夏世次》20卷（又称《西夏国谱》），从其书名可以推测是一部西夏人编修的以叙夏国帝王世次为主的编年史书，可惜也没有留存下来。胡玉冰认为“从编修质量来看，《辽史·西夏外记》是三史《夏国传》中最差的。史料错误较多……”[①]这个看法言之有理。

第三，对宋代汉文西夏地理文献的梳理。《文献研究》指出：“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在一些西夏文献中有零星的西夏地理史料，在西夏汉文文献中，西夏地理史料则较罕见，而在汉文西夏文献中却存有相对较多的西夏地理史料。”[②]宋代形成的西夏地理文献最多，成为宋以后关于西夏地理文献编修的基础，传世的宋代以后的西夏地理文献，几乎都是在宋代基础上编写而成。因而，宋代西夏地理文献成为研究西夏地理问题的文献基础。“利用传世文献的记载对西夏地理进行研究是目前研究西夏地理较常使用的方法。通过梳理传世的西夏地理文献，可以对西夏国的地理位置、山川地貌、疆域形成、政区沿革、交通道路、西夏与周边地区的地缘关系以及西夏国的生态气候等问题进行研究。”[③]可以说，这是宋代汉文西夏文献史料价值的突出表现。

大量的西夏地理文献散见于宋人文集及《宋朝诸臣奏议》、宋代文献的西夏专题部分、两宋时期私家撰写的全国性地理志、宋代部分史籍和笔记四部分中。该书指出，宋代汉文西夏地理文献可归纳为三类：专书文献、地图文献、图经文献。成于宋代的西夏地理文献绝大多数已经亡佚了，留存至今的西夏地理文献对于研究西夏地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传世的西夏地图文献中，唯一一幅以西夏国地理为绘制主题的《西夏地形图》，学者对其成图时间说法不一。关于西夏地理信息，《华夷图》《地理图》《历代地理执掌图》《东震旦地理图》和《契丹地理之图》等宋代地图都有所标注，仅仅是标注内容详略不同。在专书和专题文献中，《西夏堡寨》所述虽然不以西夏地理为主要对象，但对于研究西夏地理仍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武经总要·西蕃地理》提供的西夏有关的地理信息是宋人文献中最为集中和丰富的。宋代西夏地图文献以《玉海》所记为最多、最集中。

宋代重视绘制西夏地图文献的原因，多出于军事战争、疆界勘分的需要。但一些地图文献因各种原因亡佚。亡佚的西夏地图文献与地理专书共有8种：1.《西夏贺兰山图》，今已佚；2. 滋福殿藏含西夏地理信息，《陕西二十三州地图》《灵州图》《甘、沙、伊、凉等州图》《环庆清远军至灵州地图》；3.《河西陇右图》；4.《鄜延边境图》；5.《麟州屈野河界图》；6. 孙巽《夏国枢要》[④]；7. 游师雄《元祐分疆录》；8. 赵珣《聚米图经》。

传世的关于西夏地图文献有：1.《华夷图》《地理图》和《舆地图》中的“党项夏国”；2.《历代地理执掌图》中的“夏”及“夏国”，在《圣朝元丰九域图》中，西夏国在地域标注中有非常醒目的“西夏”字样，这幅图的说明文字对西夏的历史沿革进行了详细解读，提到“然自祖宗以来，服叛不常。朝廷易其小寇，不即讨除彼盗有之地，故《元丰九域志》列之为化外云”[⑤]；3.《东震旦地理图》（志盘所编《佛祖统纪》所附）、《十五国风地理之图》及《契丹地理之图》；4.《事林广记》载图中的“西夏”“西夏国”。

---

①胡玉冰：《传统典籍中汉文西夏文献研究》，第194页。

②胡玉冰：《传统典籍中汉文西夏文献研究》，第60页。

③胡玉冰：《传统典籍中汉文西夏文献研究》，第63页。

④（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00《经籍考二十七》，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742页。载：“夏国枢要，二卷。晁氏曰：皇朝孙巽纂。记夏虏兵屯会要、土地肥硗、井泉涌涸、谷粟窖藏、酋豪姓氏、名位司存，与夫城池之完缺、风俗之所向，编为两帙，上之朝。”（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7《伪史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93页。载：“右皇朝孙巽纂。记夏虏兵屯会要、土地肥硗、井泉涌涸、谷粟窖藏、酋豪姓氏、名位司存，与夫城池之完缺，风俗之所尚，编为两帙，上之于朝。”《宋史》卷486《外国二·夏国下》，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4030页。载：“今史所载追尊谥号、庙号、陵名，兼采《夏国枢要》等书，其与旧史有所抵捂，则阙疑以俟知者焉。”

⑤（宋）税安礼：《宋本历代地理指掌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3页。

传世的关于西夏的地理专书与专题文献有:《西夏堡寨》对宋与西夏边境地区的宋境内堡寨进行了介绍,因而其并非专门介绍西夏地理的文献。在传世的宋代地理文献中,真正算得上是西夏专门地理文献的是《武经总要》前集卷二十八下《边防·西蕃地界》中的部分内容。

第四,注重对已亡佚文献的稽考。《文献研究》设有专门记述西夏事的文献章节:1. 刘温润《西夏须知》《羌尔雅》(未能流传下来);2. 刘焕《西行录》;3. 张舜民《南迁录》《永乐客话》(已佚);4. 吴思《契丹西夏录》,全书已佚;5.《西夏杂记》仅见于《遂初堂书目》;6.《契丹夏州事迹》原书已佚;7.《夏台事迹》。对这些已佚文献的作者、成书背景、文献内容作了尽可能详尽的考订,对于尚存的文献在后世流传及影响也做了说明。刘焕对《西行录》解释称,全书已失传,然在一些史籍里还能找到其佚文,"尽管《西行录》记事与其他史书略有出入,但作为宋人的记述,其可信度还是很高的,至少可以提供一些异文材料,以便于后世史家辩明史实真相……又如《夏台事迹》作者解释云,吴广成在《西夏书事凡例》中曾说,王氏所提及的《西夏事略》诸书,各种说法相差较大,'较之正史,不无舛错。'此处所举《夏台事迹》似乎清朝道光初年还存有,吴广成参考此书来编西夏史"[①]。

(二)存在的问题

当然,《文献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对研究对象的史料与文献研究史的界限不分,原因为现代学科分类越发细致所致。

《文献研究》从历史文献学学科角度进行分类和研究。从广义上看,只要是记载内容,无论是直接或间接,只要和西夏相关的所有汉文文献,俱视为汉文西夏文献;从狭义上看,汉文西夏文献是指记载内容直接与西夏相关的各种用汉文记述的西夏文献,诸如涉及夏州地方政权、夏国史和夏国相关的各种汉文文献,都属于此类。本书以狭义汉文西夏文献为考述重点。"成书于宋元时期的文献史料价值最高,这些是汉文西夏文献中最基本的文献。成书于明清时期的西夏专书文献主要是对宋元汉文西夏文献的撮抄和改编。"[②]"从西夏文献的研究来看,海内外学者重点关注的是西夏国原始文献(以西夏文和汉文文献为主)的整理和研究,对史、子、集诸部中汉文西夏文献整理和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并不突出,成果数量也比较少。自20世纪30年代迄今,关于汉文西夏文献的研究论文数量不足百篇。"[③]这恰恰说明,学界对宋元史料研究与明清西夏史研究界限分明。

《文献研究》还指出:"汉文西夏文献的研究成果以对专书的考证成果为最丰富。学者主要以宋辽金三史《夏国传》、《宋西事案》、《西夏书》、《西夏书事》、《西夏志略》、《西夏纪事本末》、《西夏艺文志》、《西夏文缀》、《述善集》及《西夏地形图》等传世的西夏文献为考证对象。"[④]汉文西夏文献是中国文献宝库的重要内容,是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对于明清西夏专史,学者多从史源学角度进行研究,研究角度不够全面,研究方法较为简单。"[⑤]这恰恰是混淆了史源学与古典文献学的界限。《文献研究》作者认为传世的专书文献主要以宋元文献为辑录史料的来源,考证清楚专书文献的史料来源,可以明确各文献的史料价值及其不足,避免使用了不可靠的文献而得出不科学的结论,避免以讹传讹。另外,胡玉冰通过考证,结合相关文献进行比较分析,力求对不同时期汉文西夏文献的史料价值做出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纠正以往学者在认识上的偏颇,为学者利用汉文西夏文献提供有益的借鉴。

需要注意的是,明清时期的汉文西夏专史,在学术研究领域虽具有参考价值,但不能作为原始史料征引,这不是认识上的偏颇,而是书写历史、研究历史的基本原则,不能混淆。虽然从历史文

①胡玉冰:《传统典籍中汉文西夏文献研究》,第50页。

②胡玉冰:《传统典籍中汉文西夏文献研究》,第5页。

③胡玉冰:《传统典籍中汉文西夏文献研究》,第7页。

④胡玉冰:《传统典籍中汉文西夏文献研究》,第10页。

⑤胡玉冰:《传统典籍中汉文西夏文献研究》,第20页。

献学学科的角度，每一部文献都有正本清源的必要，如对明代祁承㸁《宋西事案》的史料来源问题，有学者认为主要取材于宋代史籍的“正史”及其有关的纪传、奏议。事实上，《宋西事案》卷上所用史料大部分摘录于《宋史纪事本末》，其卷下奏议几乎自《历代名臣奏议》中节录。周春《西夏书》，过去学者多沿用清人的说法，认为内容为10卷，其实应为15卷。关于《西夏志略》，并不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独立撰著的史学著作，它是清代学者将《古今图书集成》和《续通志》中关于西夏史料汇编部分抄录出来的，内容上未作任何改动，合二为一后冠以《西夏志略》之名单行于世。[①]所以，胡玉冰在《文献研究》中指出：“成于宋元时期的汉文西夏文献是研究西夏的基本文献，这是学界的共识，但成于明清时期的西夏专史，学界对其史料价值看法不一。”[②]

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明，在历史文献学科上，《宋西事案》《西夏书》《西夏志略》的面目逐渐明晰，因此在文献学史上乃至学术研究史上是有其价值和贡献的，这一点值得肯定。即使如此，这几部书从研究西夏历史依据史料的要求来说，它们并没有史料的利用或使用价值，这也是不能混淆的。尤其要指出的是，搞清《西夏志略》是伪作，本是一件值得赞誉的做法，却还要画蛇添足地对《西夏志略》的史料价值及其不足进行讨论，以至宽容地以为《西夏志略》有其“独特的利用价值”，这种宽容的态度不仅不利于学术发展，而且是很有害的。对于作者称，《志略》把两部书里的西夏史料照原貌抄录，合二为一，单独刊行，并不损伤原书史料价值，并省去学者翻检之苦，有助于西夏史料研究运用。笔者更不能同意，尤其是对古今的“今”学者。在印刷不发达的古代，查找和翻检图书不易，退一步来说这种“伪作”对于“古”学者可能有一些利用价值，但是对当今的学者绝不可以。培养好的历史学工作者首先要做的就是，在初学阶段培养他们使用原始史料的自觉，为何不径直从宋元史料中搜集做起，而要从二手文献中翻检材料呢？更何况自进入21世纪以来，电子检索已为寻找原始史料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从这个角度出发，必须对该书的观点求全责备。

可能是限于编写和研究内容的框架，《文献研究》并没有包括唐、五代有关汉文党项史料的裒辑和梳理。众所周知，魏、晋、隋、唐、五代的党项史研究与西夏史研究两者是一个整体，不可或缺，正如韩荫晟先生所言：“自唐代以来，党项族就散居于我国西北广大地区。五代以来，宋和辽、金境内都居住许多党项族。西夏境内虽然居住着大量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其政府机构也曾任用许多汉人和其他族人，但它毕竟是以党项拓跋氏族为核心的封建王朝。因此，研究党项必须包括西夏，而研究西夏则必须突出党项。”[③]因而缺少对唐五代汉文党项史料或文献的梳理和研究，不仅反映出从历史文献学（古典文献学）学科对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所存在的局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这部书的学术和使用价值。另外一个不足是对宋、元、明、清时期经部文献没有给以重视，关于这一点，史学界还未有人论及。

三、关于吴广成《西夏书事》的价值

如前所述，《文献研究》对《西夏书事》的价值有较多的肯定，对此笔者有不同的意见。由于这部书对西夏史研究产生过较大影响，故单独进行评议。在清末学者撰写的西夏历史著作中，吴广成的《西夏书事》问世最早，篇幅也最大，加之原书既有编年也有纲目，查阅起来比较方便，所以戴维理亚1898年首次向国际东方学界介绍西夏历史时，几乎就全以《西夏书事》为依据。自此之后，这部书就一直被视为研究西夏史的首要参考著作。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来看，吴广成《西夏书事》在清末学者撰写的西夏历史著作中成就最高，其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参看胡玉冰：《传统典籍中汉文西夏文献研究》，第21页。

②胡玉冰：《传统典籍中汉文西夏文献研究》，第21页。

③韩荫晟：《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前言，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第一,钩沉和系统归纳了宋元人的记载。吴广成在搜集资料上是很下功夫的,“寒暑十周,始蒇厥事”,“是编分年析月悉尊三史帝纪、夏国附传,或尊王氏僃(笔者按:“僃”应为“称”)《东都事略》、李氏焘《通鉴长编》及薛氏应旂《宋元通鉴》、商氏辂《宋元续纲目》,王氏宗沐、徐氏乾学、毕氏沅《通鉴后编》《续通鉴》诸书……至于前贤章奏、郡国图经以及家乘、志铭、丛谈、野说见有不同,词多相戾,窃附己意订正之。然必详溯根原,借征确据,非敢凭空臆断焉”①。由此可见,吴广成对宋元人的记载不同于一般的辑佚,只做简单的荟集,而是根据自己的研究对史料作了一定整合。

第二,对西夏政治军事事件、制度、人物作了初步的勾勒,对《宋史·夏国传》有较多补充,直到现今仍然被一些研究西夏政治军事史的学者所征引。

第三,宋夏关系史叙述最为突出。宋人对西夏的记载多限于双方的来往,因而留下宋、夏关系方面的材料最为丰富,所以《西夏书事》的内容也主要是从附丽于周边王朝(五代、辽、宋、金、蒙古)的材料中反映出的民族关系,特别是从与宋朝的关系来考察西夏党项人自兴起到灭亡的历史活动,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西夏书事》实际上就是以宋人文献为主的一部宋夏关系史②。

贡献之外,吴广成《西夏书事》的局限也有三点:

第一,所引数据一律不作出处,这直接影响了《西夏书事》的可信度,虽然编者自己强调对征引的材料“必详溯根原,借征确据,非敢凭空臆断焉”③。但也很难让后人完全相信,因为无法分清哪些言之有据,哪些是作者引申发挥,整理过的文献毕竟是二手资料,会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臆断、错讹的遗憾。同时,正如前引吴广成在编写凡例中表明大量引用明清时期的二手历史著作如“薛氏应旂《宋元通鉴》、商氏辂《宋元续纲目》,王氏宗沐、徐氏乾学、毕氏沅《通鉴后编》《续通鉴》诸书”④,更是对《西夏书事》使用价值的降低。学者如此评价此书:“我们应该有把握地断定,吴广成写下的东西并不都是从古书里忠实摘录的,而是加入了他本人的许多杜撰和演义成分。坦率地说,即使是演义,吴广成的著述态度也是不负责任的……”⑤这一评价可谓鞭辟入里。关于对《西夏书事》的使用,笔者一向认为不适合作为原始资料征引,而是作为带有研究性质的重要著作来参考。

第二,体例、观点陈旧。吴广成比照前人修霸国史书的成例,仿朱熹纲目体,对西夏三百年历史多有评论,除了少数评价较为客观外,大多数评价都是充斥着纲常礼教的观念和所谓的寓褒贬的春秋笔法,让人难以卒读。其材料的取舍,也与此有一定关系。

第三,对西夏后期历史叙述过于简略。由于《西夏书事》主要依赖宋人记载,南宋以后与西夏交往基本隔绝,有关西夏的记载遽减,因而吴广成也只能付之阙如。全书42卷,前两卷叙述唐僖宗至后周显德六年党项族兴起的历史,卷三十四至卷四十二叙述北宋灭亡至西夏灭亡约一百年的历史,两者相加仅10卷,而叙述北宋时期相应的西夏历史占32卷⑥。

当然明清人辑录的西夏专史,可以作为熟悉事实的工具书阅读,但是征引史料则一定要查事实的史源出处。作为辑录西夏专史,辑录者对史实的解释或所加按语,在研究某一事件、或某一个人物、或某些典章制度时,是可以作为一种意见或一家之言来对待的。最后再一次重申笔者的基本观点:明清时期的汉文西夏专史,具有学术上的研究参考价值,不能作为原始史料征引。

[责任编辑:马晓雪]

①(清)吴广成撰;龚世俊,胡玉冰,陈广恩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凡例,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②李华瑞:《黑水城出土文献与西夏史研究》,《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4期。

③(清)吴广成撰;龚世俊,胡玉冰,陈广恩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凡例,第2页。

④(清)吴广成撰;龚世俊,胡玉冰,陈广恩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凡例,第2页。

⑤聂鸿音:《西夏遗文录》,《西夏学》第2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5页。

⑥参看李华瑞:《黑水城出土文献与西夏史研究》,《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4期。